

目 录

本期话题

“中国概况”课程建设与跨文化教学

主持人语	郭 鹏	03
中国式认知方式的文化表征与跨文化教学	陈 忠	04
从概要介绍到分级教学——“中国概况”教材编写发展分析	刘元满 李 欣	10
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概况”在线课程的领域模型设计	陈 闻	22
论“中国概况”数字课程与新形态教材的融合	王 群	30

教材研究

建议用“字词表”代替“生词表”	鲁健骥	38
两部初级汉语综合教材结果补语编写的对比分析及启示	洪 炜 黄天妮	45

学习与认知研究

学习者情感与学习自主性关系研究	李守纪	56
语用失误视角下的留学生语言社会化探讨	王春辉 孙弘扬	65

测试与评估研究

来华留学预科生阅读能力描述语任务难度研究	王 爽 王佳旻	73
----------------------------	---------	----

教育技术

学习者视角下的国际中文慕课建设：一种比较的路径	周汶霏 宁继鸣	82
-------------------------------	---------	----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专栏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成立 33 周年回顾与展望——纪念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 70 周年	袁 礼 田会超	90
--	---------	----

GUOJI HANYU JIAOXUE YANJI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No. 3 2020
(Serial No. 27)

CONTENTS

On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ognitive Style and Cross-cultural Culture Teaching ·····	CHEN Zhong	04
From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Graded Teaching”: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roductory Books about China ·····	LIU Yuanman, LI Xin	10
The Domain Model Design of “China Panorama” Online Cours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	CHEN Wen	22
A Discuss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Panorama” Digital Course and New-Form Textbooks ·····	WANG Qun	30
Substituting “List of <i>Zi</i> and Words” for “List of New Words”: A Suggestion ·····	LU Jianji	38
Resultative Complements in Two Elementary Chinese Comprehensive Textbook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 Inspiration Gained ·····	HONG Wei, HUANG Tianni	45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ers’ Emotions and Their Learning Autonomy ·····	LI Shouji	56
On Foreign Students’ Language Soci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 Failure ·····	WANG Chunhui, SUN Hongyang	65
A Study of the Task Difficulty of the Can-Do Statements for Chinese Reading Proficiency of College-Pre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	WANG Shuang, WANG Jimin	73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MOO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er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	ZHOU Wenfei, NING Jiming	82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CLT) — Commemo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	YUAN Li, TIAN Huichao	90

本期话题

“中国概况”课程建设与跨文化教学

主持人语

郭 鹏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

在任何一种目的语教学中，目的语国家的国情文化教学在课程体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国际中文教育体系中，“中国概况”课已发展为一门既有历史厚重感又面向新时代，有助于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极富特色的必修课。《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编辑部独具只眼，嘱我围绕“中国概况”课程建设与跨文化教学主题邀请专家进行专题研讨，并于付梓之际拟一弁言置于篇首，我简要写以下几点，供方家批评。

其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多数学者认为，文化教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必要制定规范的教学大纲。对文化因素、文化项目进行定位与定量处理，参考语言类大纲制定文化教学大纲，是教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概况教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的中国认知有一定差异，也各有特点，国情文化教学在帮助外国学生建构中国认知以及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时，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在具备一定教学规范的基础上，有必要深究特色化、本土化的问题。教学的特色化和本土化是国际中文教育提质增效的根本路径。这不仅被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是处理好全球化与地方本土经验之间张力关系的必然要求，更符合“一带一路”倡议重视区域文化发展特点的理念。

其三，对新生代学习者而言，数字技术不单是工具，已经是生活内容和方式本身。随着“互联网+”的深度融入，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移动学习、泛在学习、混合学习、在线课程学习等，正在成为学习的主流模式，而教学的数字化、教学与智能技术的结合，也是中国概况教学创新的必然内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出，学习通常要经过“吸收”与“内化”两个关键阶段，后一阶段是意义建构的关键。数字课程带给教学和学习意义，不仅是教学内容的精约化、图像化和多样化，而且通过共时性、多维性的“翻转”，可以重构学习路径，不间断地满足学习需求，促使“吸收”与“内化”加速循环，当然还可以通过在线学习与面对面教学的融合，实现更具掌控感的个性化学习。

这里仍需强调一点，教学创新及其研究归根到底要服务于如何更好地实现教学目的。毫无疑问，包括中国概况教学在内的文化教学，核心目标在于提高外国学生关于目的语文化的跨文化意识，因为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接受和移情是学习者达到更高语言水平的必经之路。文化教学的目的不是单纯向学生讲授文化知识，而是利用文化知识帮助学生建构一种对目的语文化行为的认知，并且为成功的目的语跨文化交际进行潜在的铺垫。

中国式认知方式的文化表征与跨文化教学*

陈 忠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一、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

中国国情与文化的跨文化教学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在中外文化对比中从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碎片之中抽取、概括出一条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主线,通过这条主线架起一座连接中外文化理解的桥梁,提高中国文化教学的可操作性,降低跨文化理解的难度。

本文的思路是,通过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比,从器物、园林建筑、语言交际、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叙事方式中提炼出中国式文化内核及其表征规律,探寻文化特征与认知方式的互动关系,对中国国情文化教学提供顶层设计上的借鉴。

二、民族心理中的中国式文化表征——中国式认知方式

中国和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差异,虽然从物质到精神、从外部到内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体现,但其实贯穿中外文化差异的核心和根源,是隐藏于中国文化这座冰山下的中国式认知方式的文化表征。中国式认知方式是贯通物质和精神、外部和内部各个领域的中介和枢纽。找到中国式认知方式,就找到了中西文化差异的纲,纲举目张:上可贯通物质和精神、外部和内部诸领域,下可聚合形形色色的文化表征形式。

就像人有左利手、右利手的偏好一样,一个文化群体也会在多种认知方式的使用中形成选择上的优势。我们将一种文化在多种认知方式中的优势认知方式称为认知定势。

夏甄陶(1988)认为,“认知定势是现实的认识主体完成一种认识所必需的现实的内部准备状态和主体性条件,由相互作用的世界观、知识、思维方式、经验和需要意识、价值观念以及意志、情绪构成。它一旦形成后就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惯性”。夏甄陶(1987)指出,“人们置身于某种知识背景下,接受了某种概念和理论框架、观念和思维模式,形成一种固定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它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定势”。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哲学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左右着人类文化群体的认知方式。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张世英,1993)两种类型。天人合一型倾向于立足客体中心来观察、认知、表征世界,这种类型的文化可以称为“客体中心型”文化;主客二分型倾向于通过自我中心来观察、认知、表征世界,这种类型的文化可以称为“自我中心型”或“主体中心型”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塑造的认知方式受到客体、自我不同观察视角的限制,会分别优先选择不同的方式认知世界,所得出的认知结果也可能不同。例如,对于“打折”这个概念,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的理解和计算方式就截然不同:“打7折”在英语中是“30% off”。再比如:关于翻页的方向,中国人的“向前翻”在欧美人看来是“向后翻”;“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在英文中变成了“future”,而不是“destiny”。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中国式认知方式跟欧美认知方式的差异。

* 本文受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面向全球孔子学院的中国概况教学创新研究及数字课程建设”(18ZDA339)资助。
<https://www.purpleculture.net>

中国文化的主线或明或暗地贯穿于文化表征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基于“天人合一”思想（张岱年，1985）的“客体中心”认知定势，它渗透于中国哲学、思想、语言交际、小说和戏剧叙事方式、园林设计、绘画各个领域，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乃至认知方式的基调（Chen, 2016）。其典型代表体现于中国人的姓前置于名的组合顺序之中。在空间上，“客体中心”认知定势立足于背衬来源展开认知；在时间上，它则是立足于以往和当下的背衬展开认知。

发端于古希腊文明的欧美文化强调人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对立。古希腊智者学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哲学思想。在苏格拉底之后，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主客二分、主体中心的哲学思想成为古希腊哲学的核心内容。主体目标优先于客体的哲学思想贯穿于欧洲文化中的绘画、小说和戏剧叙事方式、语言规则、园林设计各个领域，形成欧洲传统的主体目标取向型认知方式。其典型代表体现于欧美人姓后置于名的组合顺序之中。在空间上，“目标取向”认知定势立足目标展开认知；在时间上，它则是立足未来展开认知。

三、外在器物领域中的中国式认知方式及其文化表征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采用散点透视，人随景移，景随人动，淡化固定观察视角，将观察者融于客体天然自在的空间布局走向之中，体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物我和合交融的主客和合关系理念。西方油画采用焦点透视，构图突出观察者的固定视角效果，主体的痕迹呼之欲出。以上中西不同的绘画理念背后，是“客体中心背衬取向”与“自我中心目标取向”认知定势的差异的具体体现。

中国园林艺术也处处体现“客体中心”的取法自然设计理念，尽可能顺应山水地形的天然走势，淡隐人工设计的痕迹，使人与自然山水浑然一体，在天然淡雅中追求一种主客和合、交融和谐、天然归真的美感。而西方园林则刻意营造人工改造干预的效果，讲求规则、整齐之美，体现出人在自然中的自我印记。

四、内在精神领域的中国式认知方式及其文化表征

在背衬—显体（ground-figure）的关系上，“客体中心”理念体现为“背衬取向”的认知定势，导致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在认知方式上存在差异。

背衬是我们认知某个目标对象所依赖的参照，显体是认知的目标。（Talmy, 2000: 316）在背衬和显体的优先程度方面，中国文化跟欧美文化受到客体中心和自我中心认知定势的影响而存在对立。认知一个事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一种是采取背衬取向的方式，像剥圆葱一样从背衬视域由远及近逐步推进到局部视域，最终聚焦、锁定目标。其特征是背衬先于显体，如果背衬和显体只呈现一个，则按背衬取向呈现。其常规表征顺序是：参照先于目标，成本先于收益，整体先于局部。

“目标取向”认知定势在背衬—显体关系上体现为目标显体优先。目标显体取向式认知方式的顺序是，由局部目标视域逐渐扩大到外围整体背衬，视域由近到远、由局部目标到整体背衬逐步展示。其显体先于背衬呈现。如果背衬和显体只呈现一个，则优先呈现显体。这一原理在“打折”这一概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4.1 基于“背衬取向”的中国式认知方式——打折

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在“客体中心背衬取向”与“主体中心目标取向”认知定势上的差异，影响到其各自对于打折概念的认知和表征。

在商品交易中,一旦顾客对商品或服务感到满意,以较低成本(指顾客实际要付的钱)获取较高收益就成为顾客关注的目标。折扣是指在商品交易中让利和原价的比例。理论上折扣既可立足成本,也可立足收益(指顾客实际节省的钱)率进行计算。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虽然都把收益率作为商品交易的关注目标,把成本作为背衬,然而在折扣的界定上却存在不同。中国式认知定势是背衬取向,立足成本看利润,撇开收益率以成本来界定折扣(见图1);而欧美认知定势是目标取向,因此撇开成本,通过直接显示交易的收益率来界定折扣(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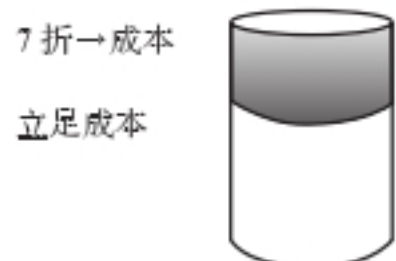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文化中的7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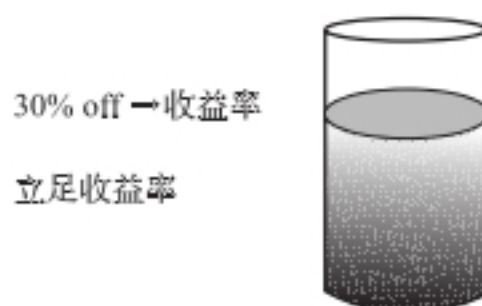


图2 欧美文化中的7折

汉语“7折”立足成本(背衬)计算折扣,表示支付原价的70%;而英语“30% off”立足收益率(显体)计算折扣,表示少支付30%。折扣的计算方式不同,是中国式认识方式和欧美认知方式差异的一种体现。

4.2 基于“背衬取向”的中国式人物介绍方式

“背衬取向”认知定势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先关注背衬来源,立足于背衬来源看去向。这一认知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对人物介绍的方式及信息的选择。我们在介绍陌生人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关注他来自什么地方,选择介绍其籍贯和家世背衬。这也是中国小说人物出场时所惯常使用的手法。面对陌生人,“从哪里来”是中国受众最为关注的信息。

《三国演义》介绍刘、关、张出场:

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
玄德曰:“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

……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

再看如何介绍曹操出场:

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
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

介绍董卓出场仍凸显籍贯:

且说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官拜河东太守,自来骄傲。

无独有偶,《红楼梦》第一回介绍清楚了故事来由,接下来出场的两个人就都是介绍其背衬籍贯信息。贾雨村的出场也是介绍其籍贯,还附带介绍其家族背衬:

这士隐正在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

贾雨村金榜题名,当上太爷,甄士隐岳父封肃介绍:

原来新任太爷姓贾名化,本湖州人氏,曾与女婿旧交……

介绍林黛玉的父亲仍沿用此法:

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方,闻得今年盐政点的是林如海。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

有趣的是,《水浒传》询问陌生人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关注对方的籍贯来历:

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

鲁提辖以及史进自我介绍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甚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

鲁达在酒店与卖唱女子金翠莲的问答也是首先提到籍贯与家世背衬:

鲁达问道:“你两个是那里人家?为甚啼哭?”那妇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禀:奴家是东京人氏……”

再看传统戏剧中的人物出场。《西厢记》第一折中张生出场,先介绍籍贯和家族身世:

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先人拜礼部尚书……

与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姆雷特》第一场介绍人物出场时,没有介绍出场人物的背衬籍贯。这与中国小说和戏剧惯常使用的人物出场模式形成强烈反差。

《变色龙》中主人公奥楚蔑洛夫的出场作者就没有介绍其籍贯或家族背衬:

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巡警,端着一个筛子,里面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

又如《战争与和平》开头部分公爵的出场:

“我的天,大打出手,好不激烈!”一位进来的公爵答道,对这种接见丝毫不感到困惑,他穿着绣花的宫廷礼服、长筒袜子、短靴皮鞋,佩戴着多枚明星勋章,扁平的面部流露出愉快的表情。

下面是《天堂》开头的人物介绍:

他们先开枪打死了那个白人女孩。

还有《百年孤独》开头对人物出场的介绍:

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西方小说、戏剧、影视往往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引出人物出场,当然也有介绍人物籍贯、家世背衬的,但这种模式仅限于个案,没有传统的中国小说、戏剧使用得那么普遍。受到西方的影响,“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影视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显体导向来开篇。但较为传统的作家和观众还是喜爱背衬取向的传统中国式开篇方式。

中国人的背衬来源认知定势不但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而且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在海外的华人建立了起很多同乡会,如福建同乡会、浙江同乡会。相比之下,欧美人很少建立同乡会,他们更喜欢建立行业协会和各类俱乐部。

4.3 基于“背衬取向”的中国式叙事方式

“背衬取向”认知定势渗透进民族心理、叙事方式和审美情趣之中。中国传统小说大多按照时间顺序,从故事的背衬开始依次展开,以此来推进故事情节。中国电影在叙事方式上很少采用西方电影那么多的倒叙手法来展开故事情节。中国观众习惯于从故事的背衬开始顺时推进故事情节的叙事方式,不太习惯显体先于背衬的时空穿插叙事方式。中国的科幻和穿越影片绝大多数取材于历史,穿越到古代的内容远多于穿越到未来的内容。相比之下,欧美有关未来的科幻片比例远高于中国。

中国人规划未来的发展,也总是习惯于将目光投向以往寻找历史依据。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将未来的规划与2000年前的历史关联起来。相比之下,欧美很少采用类似的方式来规划未来。

4.4 基于“背衬取向”的中国式民族心理

认知定势影响到我们如何认知周围的世界和人生。背衬取向认知定势优先关注来源,侧重了解从哪里来。在社会人文领域,其表现为更关注祖先及今生今世,对来世的思考和关注则不及对祖先和今世的关注那么多。

2000多年前的孔子曾告诫其弟子:“未知生,焉知死?”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时也是通过其过往的表现来评判的。孔子《论语·为政第二》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中国自有史以来,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把祭祀先祖看作头等大事。这种文化所塑造的认知方式倾向于通过过往和祖先的成就来评价当今的某种创新成果。譬如:数十年前,中国的民间药方广告用语推崇“祖传秘方”;有的药物典籍是以祖先的名字命名的,如《黄帝内经》。而欧美商业广告讲究“最新配方”。随着中西文化交融,中国的广告也基本告别传统的祖先崇拜倾向,代之以“最新”配方。

基于“目标取向”型认知方式的文化土壤所形成的宗教立足于人生的来世看待今生的生活,西方宗教无一例外都将人生来世作为重大宗教课题。而基于“背衬取向”认知方式的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则立足于过往和今生之间的联系来看待和处理今生今世的生活信条和人际关系,这也是背衬取向认知定势在人生价值观当中的表现之一。

4.5 中国式认知定势与姓和名的组织顺序

2020年,美国奥克兰兰尼大学一名教授要求一名亚裔学生Phuc Bui改名,理由是她的名字用英语读“不雅”。该学生拒绝了他的“歧视性”要求,这名教授因涉种族歧视被停职。这个事件的背后折射出一个现实,姓名的呈现方式也是体现个人及民族尊严的一种方式,因为姓名承载着一个种族、民族的文化基因。

姓蕴含一个人父系祖先的背衬信息,是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群体符号。名是个体区别于他人的个体符号。姓在前名在后,是通过家族谱系背衬来确认家族中的个体,从其家族成员的集合中确认其个体身份和属性,是一个由群体向个体逐步缩小搜索范围直至确认个体身份的“背衬取向式”搜索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背衬取向式”搜索过程



图4 “目标取向式”搜索过程

将姓放在名字之后的命名方式,是通过个体确认其家族谱系背衬,将视野从个体扩展到其所属家族姓氏群体范围来确认身份,如图4所示。汉语和欧美语言姓氏和名字的不同分布顺序,体现出背衬取向和目标取向两种认知定势对姓名结构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姓和名的这种组合顺序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跟该语言文化背后的认知方式保持一致的。可以说,从一种文化中姓和名的排列顺序,我们就可以判断其认知定势的类型,从而预测出其他文化表征的倾向性。

4.6 中国式头衔的表征顺序

头衔是在社会交际中表明被称谓者的职务、职衔、专业级别的身份标志,如“主席、总统、局长、教授、博士、律师”等。头衔如果跟姓名组合起来使用,一般是在明确了被称谓者的姓名之后,为进一步确定其社会身份,而对头衔刻意突出以示尊重。因此头衔跟姓名一起使用时头衔是显体,姓名是已知信息,充当背衬。汉语背衬取向的认知定势要求背衬先于显体呈现,而英语显体先于背衬,因此汉语姓名先于头衔、英

<https://www.purpleculture.net>

语头衔先于姓名的顺序符合各自的认知定势。如“特朗普总统”在英语中是“President Trump”。

为了表示更高的尊重程度，我们还可以凸显比头衔更礼貌的“Mr.”“先生”或“Madam”“女士”。此时，头衔就退居背衬的位置，显体由突出尊重信息的“Mr.”“先生”或“Madam”“女士”充当。受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认知顺序定势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汉语和英语的表达顺序仍然相反。如：

英语：Mr. President	
汉语：总统	先生

无论称呼内容怎么变，在多个称呼语成分的组合中，汉语始终遵循背衬先于显体的原则，英语始终坚持显体先于背衬的原则。这是文化特征使然。掌握了中国式认知方式，就可以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举一反三，以不变应万变。

4.7 中国式社交礼仪中的尊与谦

基于客体中心文化传统的认知方式，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以尊重和抬高对方、贬损自我作为礼貌的准则，追求主宾和合融洽。这种认知方式使汉语发展出了发达的敬称和谦称体系。例如：贵姓、贵校、贵公司、大作、贵府；敝姓、敝校、敝公司、拙作、寒舍。相比之下，欧美文化由于自我中心目标取向的认知定势，则缺乏上述敬称和谦称的系列对应词语。主客和合文化一方面抬升对方，另一方面通过贬损自我也可以相对抬升对方，从而显示尊重与礼貌——一尊一贬都是在抬升对方。而主体中心的文化则只抬升对方，不贬损自我。即使是抬升对方，其专用的礼貌用语也远没有主客和合文化那么丰富。

人际交往中对对方表达尊重的方式，除了体现在称呼语中，还延伸至身体语言和行为方式之中。例如主客和合文化的鞠躬场合要多于主体中心的文化。此外，中国人在递接东西时用双手，以表示对长辈及地位、身份高的一方的尊重。一些美国人初次来中国交流，看到中国人在接到对方递来的名片时，会仔细地凝视一番，才收起来。从这些细节中，他们感受到一种温良敦厚的人文涵养和谦和持重的文化底蕴。

中国式礼仪也并非总会得到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的理解。中国人介绍自己的文章时，总喜欢谦虚地贬低一下文章内容和结论；赠送礼物时，会谦虚地称“不成敬意”；宴请客人时也喜欢说食物不够精美。来自主体中心文化背衬的客人会感到奇怪：既然文章没写好，结论没有把握，为何还在会议上宣读？菜肴不够精美，为何还要宴请我？可见，中国人在谦虚之余，让人感觉不够实在。这种主客和合型文化与主体中心型文化的跨文化认知断层需要对接，这个对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体中心型认知方式与客体中心型认知方式的对接与转换的过程。

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但就人类共同关注和追求的目标以及人类命运而言，这些文化差异可谓殊途同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尽管彼此的认知方式不同，只要秉持相互尊重、彼此欣赏的态度，借助于科学有效的认知转换，认知方式的差异对跨文化理解和沟通带来的障碍是能够克服的。

不管一种文化的认知方式如何，一个客观事实是：人类面临同一个世界和共同的命运，在地球环境恶化、重大疾病防控等人类灾难挑战面前，求同存异，包容借鉴，借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群体力量共同应对，是人类不同文化群体唯一理性的选择。

以上案例揭示出中国式认知方式跟欧美认知方式之间的内在差异，了解了这种差异，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国情和文化方面的教材、教学设计中，借助于中国式认知方式的文化表征所提供的一条系统性链条，横向贯通和纵向整合局部的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知识碎片，对跨文化教学进行可操作的顶层设计，引导跨文化学习者克服障碍，使他们从一种文化的认知方式向中国式认知方式转换，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而以少

<https://www.purpleculture.net>

胜多、以简驭繁,最终达到对中国文化从认知向认同的转化。

例如,教师可以在教材及教学设计中对比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的下列文化点:中国人的姓名组合顺序,打折的界定方式,中国画(清明上河图)和油画对比与欣赏,中国园林和欧美园林对比欣赏,中国和欧美小说、戏剧的叙事方式对比欣赏。

在对比欣赏的同时,教师可以引导、启发学习者从中体会上述中国文化点和自己民族的相关文化点之间的异同,讨论这些异同背后的动因。教师还可以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启发他们探索上述文化点之间的共同点,以直观方式展示天人合一理念在文化点中的具体表现。譬如,教师可以介绍中文名字背后的意思、中国人取名字的一些文化寓意、中国姓氏的由来。教师通过加深学习者对中国姓名文化背后的中国式认知方式的了解,促进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从而培养和提高学习者在本民族认知方式和中国式认知方式之间进行跨文化转换的能力。

强调中国式认知方式的特征,并非简单生硬地将自己的文化硬塞给对方。要推动跨文化受众理解中国文化,首先要以贴近对方的认知方式来对接中国文化,通过促进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认知,使他们走向对中国的积极理解。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夏甄陶.论认识系统[J].中国社会科学,1987(2):3-20.

夏甄陶.主体认知定势的更新[J].哲学动态,1988(7):17.

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1-8.

张世英.“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结合——论精神发展的阶段[J].学术月刊,1993(4):1-8.

CHEN Z (陈忠). *Case Analysis of Cognitive Switch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Encouraging Learners to Explore on Their Own the Reasons Behind* [M]. Bloomington: Xlibris, 2016.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从概要介绍到分级教学*

——“中国概况”教材编写发展分析

刘元满 李欣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一、引言

教材既是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体现者,也是联结总体设计和课堂教学的纽带,又是具体实施课堂教学的直接依据。(刘珣,1994)作为课程的主要教学材料,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教学水平和效果,同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面向全球孔子学院的中国概况教学创新研究及其数字课程建设”(18ZDA339)子项目“孔子学院中国概况教学大纲的创新研制”的成果之一。

也为教学大纲、评估标准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概况被认为是帮助国外读者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促进国家之间良性交流、合作的重要知识内容,受到国家层面重视。由原国家出版局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国概况·简明中国百科全书》(1987),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社会政治结构、法律制度、国民经济、对外贸易、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体育、卫生、旅游、民族、宗教、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和政策,全书150万字,1000余幅图片(彩色图片占1/4),是较早向外国人全面介绍当代中国国情的大型图书,也为后来的中国概况类教材在内容选取和编写形式方面提供了参考和示范。

20世纪90年代初,各高校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程体系中普遍开设了“中国文化”课程,但一般都侧重于中国文化的某个方面,系统全面介绍中国的似乎不多,教材更是缺乏。(王顺洪,1994)北京大学1991年开设了“中国概况”课程,王顺洪基于课程讲义编写的《中国概况》被列入国家汉办“1992—1995年教材规划”,初版于1994年出版,前后出了4版,印刷了17次,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中国文化教材之一。1994年6月,复旦大学陈仁凤也出版了一部《中国概况》。这两部教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师各自摸索、无共享资源的问题。

国外也有了解中国概况的需求,一些外国学者用母语编写了中国概况类教材,如日本的高桥弥守彦等(1992),德国的Hans-Jürgen van der Gieth(2006),法国的David Vauclair(2008)、Jean-Luc Domenach(2008),美国的Sharon Nakhimovsky(2008)等。如果我们能够提供更多适合外国人学习或阅读的外文版教材,也利于他们全面、准确地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规定,“文化知识课包括中国概况、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等)等课,这些课讲授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等文化背景知识,使学习者提高其语言运用的层次”。从这一定义来看,“中国概况”属于文化知识类课型,主要讲授中国的国情,与中国历史、文学并列,彼此之间是独立的。祖晓梅、陆平舟(2006)也对该课程目标做了界定,指出这是一门“旨在全面而概括性地介绍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知识,其性质相当于法语的civilization和英语的cultural studies课程”。

“中国概况”作为一门专门课程从起步到发展,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变化。对“中国概况”教材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确认该教材的性质,也可以从中了解教材编写模式以及编写变化规律,为研制合理、科学的“中国概况”课程大纲或标准提供依据。

二、“中国概况”教材种类变化

课程设立初期,主要教学对象为高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教材出版数量较少。2004年,孔子学院成立,“中国概况”列为文化类重要课程,教材需求猛增,教材出版出现密集之势。2017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将“中国概况”课列入高校学历留学生的必修科目,“中国概况”由一般汉语文化课程上升为国家对外宣传课程,编写适应新形势的新型教材变得十分迫切。

我们以“中国概况”“中国国情”为关键词,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社官网、书商网页以及“全球汉语教材库”等多种渠道,查询到近30年来正式出版的《中国概况》有15部,《中国国情》有2部,共17部,21种版本,如表1所示。

表1 近30年来正式出版的《中国概况》和《中国国情》教材(含修订版)一览表

书名	作者及著作方式	书名简称	出版者	出版年份
《中国概况》(第1~4版)	王顺洪编著	王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998、2003、2015
《中国概况》	陈仁凤主编	陈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中国概况》	夏自强主编	夏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1996
《中国国情》	肖立编著	肖版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
《中国概况》(英文版)	孙岩、熊琰、高侠编著	孙版	海洋出版社	2007
《中国国情》	肖立编著	肖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概况教程》	肖立编著	肖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中国概况》	郭鹏、程龙、姜西良编著	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中国概况》	莫海斌、邵长超、蔡贤榜等编著	莫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当代中国概况》	包文英、刘弘编著	包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中国概况》	祁述裕编著	祁版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3
《中国概况》	张胜林主编	张版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中国概况》	吴平主编	吴版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4
《中国概况》	马莹主编	马版	中国人口出版社、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7
《中国概况》(日文版)	王映哲主编	王映哲版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17
《中国概况》	程爱民主编	程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8
《中国概况》(第1~2版)	宁继鸣主编	宁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3、2018

《中国概况》《中国国情》教材(含修订版)出版时间和数量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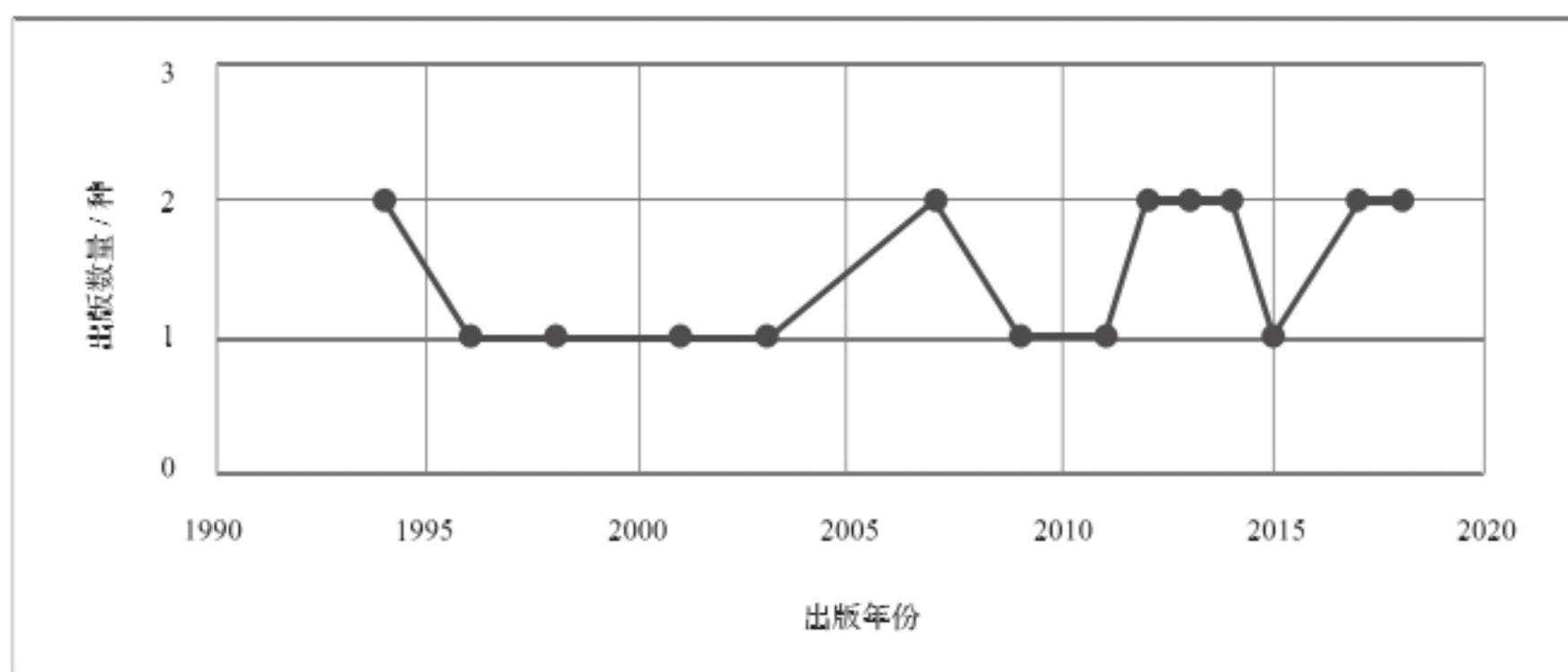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概况》《中国国情》教材(含修订版)出版时间和数量统计

2.1 通用型语言教材

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目的的不同,“中国概况”教材可分为通用型语言教材和专门型知识教材。通用型语言教材在已出版的教材中占主体,既可作为中高级语言进修生的选修课教材,也可作为学历生的必修课教材。

1994年“王版”^①和“陈版”的《中国概况》均以专题编写,之后多部教材都采用这种体例。与常规语

① 王顺洪在参考书目中把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概览》列为第一条。
<https://www.purpleculture.net>

言教材有所区别的是,《中国概况》一般并不严格控制语言难度,也没有大量的语言练习,而是强调内容理解,大多只提供理解式问答练习,如“王版”(1994)共有46道思考题^①,诸如“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多少?”“谈谈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等。近年出版的教材则注重引发跨文化思考,如“程版”(2018)共有68道思考题,引导学生思考中国文化的特点,对比中外文明的差异,诸如“孔子讲‘仁’,是希望大家都去做好先生吗?”“孟子讲‘人性本善’,中西方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等。练习题从客观知识类到主观思考类的转变,反映了从“以教材为中心”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编写理念的转变。

“中国概况”课程过去一般都在中高级阶段开设,但近年也开始从中高水平向下延伸。面向海外孔子课堂初中级学生的教材或课外读物,如《聚焦中国》(王海龙,2007)和《深入中国》(王海龙,2011)为上、下两册,分为现代工业篇、城市发展篇、百姓生活篇、世界窗口篇;面向理科留学生入学水平的教材,如“包版”(2012)有20个专题和75篇选文,每个专题中有1篇的词汇量控制在理科留学生入学的最低水平,体现了分层教学意识,这样既能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国情,也能扩大学生的词汇量,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口语能力。

随着任务型教学法、主题式教学法运用于语言教学中,“中国概况”教材编写也体现了这些教学法的特点。有的进行任务化教学设计,如“郭版”(2011)共11章,每章都设计了关键词写作、小组讨论、实践调研等任务。有的以内容为中心,设计了生词、课文、语言点、练习等综合课教材才有的板块,如“包版”(2012)配有生词表、语言点、注释,以及选择填空、口语练习、思考讨论等练习。

2.2 专门型知识教材

2017年起,学历留学生必修“中国概况”课,“中国概况”不再单纯地被作为语言类课程,而是知识类课程。海外孔子学院及针对特殊人群的教学也需要开设知识型“中国概况”课程。开设知识类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掌握有关中国的基本知识,促进国际间顺利沟通与交流,因此使用学生母语开设课程、编写教材也成为必然。一些特殊目的的教学也对“中国概况”课程提出了要求,催生出一批针对不同对象的专门型知识教材。“莫版”(2012)和“张版”(2014)用于海外华文教育的本科学生及华文教育师资培训;英文“孙版”(2007)和日文“王映哲版”(2017)可分别供英语母语和日语母语留学生使用;“祁版”(2013)供我国港澳地区和外国公务员研修培训使用。张英的《中国那个地方》(2008)面向海外华裔子女介绍中国的基本情况,共分4册,其中《龙的故乡》介绍了中国概况,全书配有汉语拼音和英文译文。

总体来说,中国概况类教材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增加:既有适用于高级阶段的教材,也有适用于初中级阶段的教材;既有面向来华留学生的教材,也有面向海外学习者的教材。同时教学对象也越来越细化。从教材数量上看,当前的“中国概况”教材基本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学习者的需要;而教材质量需要看教材研究和教学使用的反馈。很多研究表明,“中国概况”教材普遍存在知识量多、语言难度大的问题,更像中学生历史、政治教科书。(冯锐,2012;刘佳,2015;姜兴蔚,2015;孟和,2015;康洁,2015;汤蕾、杜红玉,2017)吴娟红、谢芳芳(2018)筛选了十几种中国概况、中国文化类教材,发现不少通用教材以罗列事实为主,有的还太过精深晦涩,一些内容已经脱离时代。吴琼(2018)认为,“中国概况”课具有大学通识课程和对外汉语文化课程的双重属性,所以既要注重通识课程的“系统性”和“基础性”,又要剪裁有度、通俗易懂,而当前教材大都是教科书体例的,简明有余而细节不足,整体上以单方面传递文化知识为目标,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参与性。从这些反馈来看,很有必要针对“中国概况”教材进行全面深入研究。

^① 王顺洪《中国概况》第3版(2003)又增加130道问答题,都是理解记忆题。
<https://www.purpleculture.net>

三、“中国概况”教材编写依据变化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的实施,极大地保证了教材在语言方面的编写质量;《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的推出,也有利于教材难度和篇幅的控制。

语言与文化在汉语教学中是无法分离的两个方面,文化是十分庞杂的,哪些是汉语教学的必备内容,一直是人们讨论的重点话题。卢伟的《中国文化教学大纲》(2003)中的《文化教学大纲项目一览表》是第一个正式发表的中国文化项目表,包含3个层次10个总类,又细化为31个子类和190多个文化点。该大纲从汉语交际能力和跨文化对比角度进行设计,但缺少与现实社会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历史等基本概况、国情信息。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2014)《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附有《中国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表》,为教材编写提供了极好的参考,不过其“文化项目”被作为语言能力的下级单位,并非一套独立系统的文化大纲。

2012年中山大学召开《中国概况》教材编写会议,针对教材与留学生的实际生活和汉语水平脱节、厚古薄今、话语体系陈旧、缺少跨文化视野等问题,希望合作开发出具有时代特色、受师生欢迎、内容和形式有所突破的新型教材。(张世涛,2012)此后,周小兵等(2019)从中山大学“全球汉语教材库”里的3212册教材中归纳总结出《中华文化项目表》,弥补了以往文化大纲在系统性、涵盖面以及辅助信息内容上的不足,对于语言类“中国概况”的编写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知识类“中国概况”教材的编写来说,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程爱民(2018)围绕“中国概况”课程,从课程性质上的“基础性、公共性、通识性”和“对外性”两个角度出发,精选出200多个内容点,制定出《中国概况三级指标教学大纲》:一级为限定性指标,二级为选修性指标,三级为研究性指标。这是目前唯一的“中国概况”专用教学大纲,它紧密结合“中国概况”课程教学实际,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智慧,是一个标志性成果。不过在研制方法上,内容点主要从教师的角度选取,数量有限,涵盖范围不够广泛,缺乏中国的民族、人口、华侨、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基本国情知识;一些内容点离实际生活距离较远或专业性较强,如“五声音阶”“散点透视”“中药炮制”“干热岩开采”等,而像微信、支付宝、广场舞等常见的文化现象却没有被选取。如果能够基于大规模语料库分析并从学习者角度进行调研,选取内容的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这期间,“中国概况”教材在编写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程版”(2018)在传统的纸版教材外,还提供视频教学资源库,可以线上线下、课内课外互动教学,是我国首套立体化《中国概况》教材,已出版中英文两个版本,还计划出版日语、法语、俄语、德语等多个语种的版本。

有些教材能够一版再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概况”教材在编写方面有着较为恒定的规律,具备共性的框架。再版教材除了适时更新内容外,分类也更为精细。

四、“中国概况”教材内容变化

Hammerly(1982)将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分为三类:信息文化(Informational Culture)、成就文化(Achievement Culture)和行为文化(Behavioral Culture)。周小兵等(2010)认为,文化内容的选择一般涉及两点:当代文化为主还是古代文化为主?交际文化为主还是知识文化为主?中国历史学界一般把鸦片战争

作为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分界线，所以也可将此作为古今文化知识的分界线。信息文化和成就文化大致可以对应客观文化，主要包括地理、资源、科技、成就等“已然”的文化事实；行为文化和交际文化则属于主观文化，主要指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Bennett, 2003；祖晓梅、陆平舟，2006）

我们使用谷尼舆情图悦 picdata.cn 热词分析工具^①，分不同时期提取教材目录的关键词进行热词词频分析。根据前 20 个关键词的词频，我们勾画出了“中国概况”教材不同时期内容的变化轨迹。

4.1 初建期（1994—2003）——单独主题式国情介绍

这一时期以首部《中国概况》教材出版为标志，到孔子学院成立，可依据的大纲有《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主要有 4 种教材：“王版”（1994）^②、“陈版”（1994）、“夏版”（1996）、“肖版”（2001）。这些教材采用“单独主题”的形式罗列中国国情，强调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但内容高度概括，相对缺乏逻辑联系；不强调语言要素学习和技能训练，只专注于教学内容的理解；练习较少，题型基本只有一种——“思考题”。4 种教材前 20 个关键词的词频统计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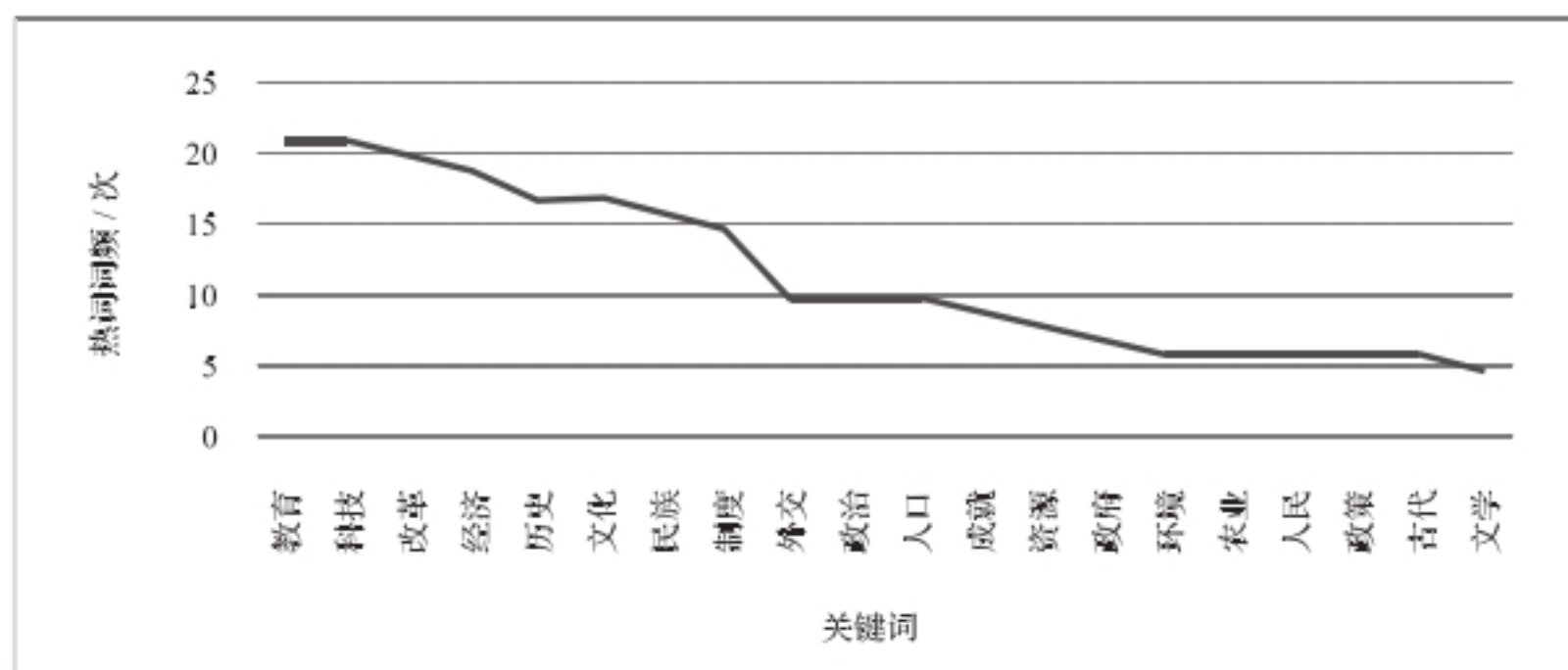


图2 初建期4种教材目录关键词词频统计

如图2所示，涉及古今文化知识的关键词可以分为三类：A类——古代知识，如“历史、古代”；B类——当代知识，如“改革、经济、民族、制度、外交、政治、人口、资源、政府、环境、农业、政策”等；C类——既包含古代知识，也包含当代知识，如“教育、科技、文化、成就、文学”等。显然，这一时期的编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概况”与一般的中国文化教材的差异，重视选取现当代的国情知识，有意识地避免“厚古薄今”的问题。

从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的分类来看，这一时期的教材内容基本都属于客观文化知识。这一时期的教材主要选取了信息文化和成就文化内容，较少涉及行为文化和交际文化，缺乏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模式，以及精神层面的态度、思想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教材初步构建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概况”内容框架，为后来的同类教材奠定了基础。

① 分析工具为：图悦（http://www.picdata.cn/picdata/ci_b.php）热词分析工具。

② “王版”这一期间出了3版，因体例、专题基本一致，我们以第1版为代表。
<https://www.purpleculture.net>